



思享客

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第①辑)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张作霖传

外国人眼中的张作霖

[英]加文·麦考马克◎著
毕万闻◎译



读懂了张作霖，也就看穿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全盘方略！

国内首部以西方人视角、
以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还原一个“比纯粹傀儡多些，
比民族主义者少些”的张作霖传记！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张作霖传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英】加文·麦考马克 著
毕万闻 译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张作霖传：外国人眼中的张作霖 / (英) 麦考马克(McCormack,G.) 著；毕万闻译.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561-0444-4

I. ①张… II. ①麦… ②毕… III. ①张作霖（1875~1928）—传记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0788号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By Gavan McCormack

Copyright ©Gavan McCormack, 1977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by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张作霖传

著 者 （英）加文·麦考马克

译 者 毕万闻

出 版 人 谢清风

策 划 人 周 政

责任编辑 聂双武 张德才

装帧设计 彭意明

内文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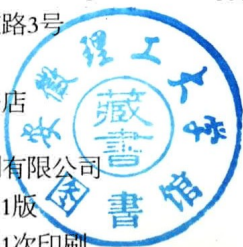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0444-4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中外交流由来已久，自传说中秦时徐福东渡扶桑，至汉唐东西方交往日炙，再至近代以来中国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之中与世界融为一体。伴随这种交往与融合，中国逐渐为世界所了解和接受。迄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之一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因制度、文化、地域等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中西方之间的误解和歧见，并未因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贸易的紧密联系而消弭，反倒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制度和文化壁垒。

如何与世界其他国家对话，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 and 接受中国，除了我们主动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之外，同样也需要我们去了解世界。如何了解世界，或许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体认世界其他国家看待中国及中国人的惯常思维及评价方式。

“思享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即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旨在通过译介外国人著述的有关中国的人物、事件、制度、文化等方面的传记及其他类型图书，让国人从中体悟他们看待中国的独特思维、独特视角，以此来反思和确认中国在全球文化视野下的真实影像，找准世界眼光中

的中国，从而更好地与世界融合，与其他民族和谐并峙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系列丛书所选译的均是海外有影响的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畅销书作家或曾见证中国历史变迁的亲历者，译者亦多为该领域的研究专家，并且所有译文都经编辑人员据原文认真核定，以便尽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但由于我们编辑人员的学识水平有限，其中难免错讹之处，敬希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以便我们有机会重印再版时更正。

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再版序言

很高兴这本书在经过了毕万闻先生重新修订翻译后，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出版社编辑和毕先生为此做出的辛勤努力。

有关张作霖和东北历史的研究，我是从1969年伦敦大学的一个博士课题开始的。1974年它先是以论文形式完成，然后于1977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进一步的修订、扩充并出版，简体中文版是与中国社会科学吉林分院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合作，于1988年首次出版。

在我起初开展这项研究的时候，访问中国是非常困难的，想要获得相关的档案资料更是不可能的事。直到1985年我才第一次访问中国，我受邀到中国东北的各个机构进行演讲，并且遇到了本书的译者——毕万闻先生，以及其他专家学者。那一次中国之行让我意识到，关于东北历史研究正在成为中国新一代学者研究的一个庞大的领域。

由于个人及专业缘由，这些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和深入思考日本问题。在此之前，我也曾发表过一些研究张作霖的论文，这为接下来的撰写一本关于“满洲国”的书稿打下基础。因为本人研究关于日本的历史要比中国的多，因此这本关于“满洲国”的书稿更多是基于日本的材料。由于我之后忙于其他项目，这本书一直未能完成。

我逐渐将我的关注重心从中国转到了日本，转移到日本历史的核心问

题——民主、现代化、宪法、战争与战争记忆、身份、公民社会、社会运动，以及日本与亚洲（主要指中国和韩国）、美国的关系上来。1999年我的一本书《虚幻的乐园：战后日本综合研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并出版(*The Emptiness of Japanese Affluence*, New York: M.E. Sharpe, 1996)。2008年我的另一本书《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Resistant Islands: okinawa Confront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2)在北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与乘松聪子合著的新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

有关张作霖和日本冲绳岛这两本书的写作跨越了40余年的历史，随着它们中译本的即将出版，我意识到尽管20世纪20年代的东北问题和后冷战时代东海问题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通的主线，就是都涉及如何界定东北亚各国间公正和平等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和日本民族主义调和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日本通过抹杀中国的民族性，试图遏制中国的崛起，以此来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今天，对于日本当局来说，他们在努力与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打交道，但他们拒绝与中国进行谈判，拒绝承认“钓鱼岛”的主权存在争议，这有点类似于20世纪20年代日本坚持宣扬和执行的“满蒙生命线”理论。

中国东海的那些无人居住的小岛远远比不上东北那辽阔的领域，但是在野心的驱使下，野心家们通过划分领土界线来分清“你们的领土”和“我们的领土”的痴迷却是相似的。但他们又有两个基本的区别。第一，日本的政策是基于他们声称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上的。对于日本统治集团来说，与其和中国坐下来商谈平等原则，不如集中精力考虑在美国霸权主义原则下，如何加强与其盟友的关系，并一起包围和遏制中国。第二，日本（或者日美同盟）的计划却意外地受到了相关民众抗议，尽管这些事件只是非国家级的水平。在20世纪20年代，关于东北问题，任何民间组织者是没有自由

和空间的，但今天的冲绳岛通过建立和平合作组织联结中国东海的民众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期望以此将他们的家乡和邻近的岛屿变成“和平中心”。这是我另外一本书的主题。因此，我的《张作霖传》一书强调的是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失败，而我的《冲绳岛》一书考虑的是当代的一个问题。后者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它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有可能不低于前者。

我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关于“远东政策”的内容。1927年，日本统治精英召开了东方会议。日本当时的原则是：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是绝对且不容妥协的。他们通过扶植卖国集团和建立伪满洲国来试图解决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族矛盾。这仅仅是延缓之计而已，18年后，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类似的争端有可能再次发生，日本政府在考虑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这次的矛盾之地是中国东海，在这一问题上，如果不能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建立一个“和平中心”的话，那么，小小的钓鱼岛将与90多年前的“满蒙”处于同样的战略地位。

但这次的问题不仅仅是当事国双方，这次中国和日本（实际上是全世界）面对的是如何处理和应对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在经历了数十年愚蠢又失败的中东政策之后，美国渐渐将力量撤出中东，转而努力维护其在东北亚的霸权。日本必须从根本上做出选择：要么建立一个基于平等、互惠互助的东北亚地区合作计划，要么，仍然保持由美国主导的“附庸国”身份。

现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将重新出版这本书的简体中文版，我感觉非常荣幸。

加文·麦考马克，澳洲国立大学堪培拉，澳大利亚

2013年9月

译者再版前言

记述奉系军阀张作霖生平的著作，已出版好多种了。那么，这部外国人撰写的张作霖传记，为什么还要再版呢？史学著作，可以为既往历史做记录，做解释，甚至做辩护，但主要的，还是应该为人们创造美好的未来提供镜鉴。再版本书的主旨，就在于此。

众所周知，张作霖本是亲日派，却被日本人炸死了；张死后三年，东北就被日本侵占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方面，特别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是否有应该检讨之处呢？从战略层面说，恐怕有四大原因：

第一，战略选择错误。东北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土地肥沃，劳力充沛，物产矿产皆丰。山海关一带山势险峻，关内战乱难以波及。而在张作霖统治时期（1916年前后—1928年），外敌日本尚没有做好武力侵占东北的各种准备。张作霖聪明机敏，善于吸纳人才，以他为核心，形成了稳定的奉系集团。在奉系决策层里，最能干的也最受信赖的是主管财政的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另一位是总参议兼东三省兵工厂督办杨宇霆。王主张发展教育，兴办实业，修筑铁路，“专心实修内政，把东北治理好”。杨主张入关争雄，武力夺取北京政权。张作霖欲当大总统，依从杨的主张。

于是，从1918年开始，奉军先后5次入关，断断续续地共打了8年内战。也就是说，张作霖在位期间，大多数年份都在打内战；没打仗的年份，也在

积极备战。据本书记载，在1923年以前，东北当局每年总收入的80%以上，都消耗在军费上了；1923年以后，军费开支竟然大大透支了每年的总收入。人不敷出，就巧取豪夺。办法之一，就是偷偷地滥发纸币奉票。1917年，1元奉票可以兑换1元现大洋。到1929年，60元奉票才能兑换1元现洋。8年内战，使奉票跌了60倍。钱毛了，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样穷兵黩武，怎么能使东北富强呢！

第二，拒绝改革。多年的内战，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1925年冬，爆发了郭松龄反奉事件。郭松龄不仅反对内战，还要推行资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民主改革。同情郭松龄的张学良后来说，如果郭松龄反奉成功，九一八事变就不会发生了。张作霖为了维持封建军阀的统治，当然拒绝郭松龄那样的激进改革。但忠于张作霖的王永江也反对内战，坚持改革。狡猾的张作霖，先是发“罪己诏”，发誓改弦更张，同意实行王永江建设东北的战略主张。可是，平息了郭松龄之变，张作霖就出尔反尔，继续派奉军入关打仗。在体制内坚决推行改革的王永江，只好辞职。改革，从短期收益上说，对张作霖和奉系集团，势必会有损害，但不改革，奉系集团能长久维持统治吗？如果没有张学良主政东北之后的改革，奉系集团就不可能转化为东北集团。

第三，贪腐。郭松龄事件平息之后，1926年1月，在奉系争论战略决策的高层会议上，王永江痛陈财政危机的现状：杨宇霆督办的兵工厂，一年的经费为2300万元，奉军常年的军费为1800万元，张作霖个人每年的“特支费”1000万元，这三项合在一起（官吏薪金、行政、教育等各项经费还没计算在内），已达5100万元，而奉省当时全年的收入只有3300万元。张作霖在军政两署每月都支取高额薪金，“特支费”是薪金之外的特别收入。每年的总收入才3300万元，张个人每年就要从中支出1000万元，几乎要占总收入的1/3。这是符合奉系常规的“正当”支出，张以各种名义的临时紧急支取，还不算在内；至于张其他各种额外“收入”，包括各级下属的种种“礼

品”，那就不用细说了。张作霖都这样，其各级下属能不贪腐吗？官场腐败，是中国旧社会的痼疾，北洋时期，更甚。

第四，放松甚至放弃了对潜敌日本的警惕和防范。与奉系关系最密切的强邻便是日本，而日本民族又有很强的特性。岛国狭小，资源匮乏，自古便有西向扩张的欲望。4世纪侵犯朝鲜半岛，6世纪侵朝时向唐朝开战，明朝时的倭寇大肆侵略中国东南沿海，16世纪的丰臣秀吉又一次侵略朝鲜，并扬言要把都城迁到北京。日本人又勇于弃旧图新，善于赶超先进：古代大化革新，学习中国；近代“脱亚入欧”，实行明治维新，成功地转型为资本主义强国。好勇斗狼的武士道精神与军事近代化相结合，使日军成为东亚最凶残最强悍的军队。于是，主旨侵占中国的大陆政策便公然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吞并了宝岛台湾（和钓鱼岛）；2.3亿两白银的赔款与相当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等于当时日本7年的财政收入。中国民众的巨额血汗钱养肥了日本。从侵华战争中尝到了大甜头的日本军国主义，又在日俄战争中攫取了“南满”的大量权益，随后，又把日本的“利益线”——朝鲜吞并了。下一个目标，就是日本的“生命线”——中国东北了。于是，1927年夏的“东方会议”，便把武力侵占东北作为日本近期的“最高国策”。同年秋，在奉天省工商界引导下，广大东北民众掀起了抗议日本图谋吞并东北的高潮。

奉系高层，不了解日本吗？他们比普通民众更了解。他们不仅经常与日本人打交道，许多人还访问过日本。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由于日本人的强势进取和巧妙经营，到20年代后期，以满铁和关东军为代表的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和军事势力，实际上已在东北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宛如巨大的毒蛇，趴在东北土地上，吮吸着东北民众的膏血。近两万装备精良作战凶顽的关东军和铁路守备队常驻东北。东北的钢铁和煤炭生产已大多操控在日本人手里。正

如本书所说，当时东北大部分经济收益都已落入日本人的手里。要害在于：日本既强且狡，奉系既弱且腐。奉系既要仰靠日本的扶持来维持对东北的统治，更渴望在人关争雄中获得日本的支援。1925年张作霖依靠关东军的援助才镇压了郭松龄。1927年秋，日本强逼张作霖签订“满蒙新五路密约”，张接受了日本人500万日元的贿金。后来，在伪满政府高官中，有奉系背景的占82%。

奉系高层的上述四大战略错误，削弱了自身，增强了日寇。这就为日本制造皇姑屯炸车案和九一八事变提供了方便。“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显然，奉系高层的四大错误，不是自强，而是自伐。到头来，张作霖丧了老命，奉系地盘（东北）也丢掉了；害了国家，也害了自己。阅读本书，定会使读者深思这些重大问题。

当今，日本安倍晋三政府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正在加紧进行。剑指何方？深受日本侵华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最清楚。我们必须强国强军，以强止战，以必胜止战。怎样才能强国强军？只有坚定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彻底地根治贪污腐败才行。深化改革是自强，贪污腐败是自伐。我们只要自强，不要自伐！

长春师大 郑慧娜

吉林省社科院 毕万闻

二〇一四年八月 于长春

导论

张作霖是偏僻的边疆地区一伙土匪的头子。他是个文盲，个子矮小，外表文弱，留着八字胡。在吸食鸦片和彻夜赌博的间隙里，他常常梦想着当上中国的皇帝。与许多可能也有过这个梦想的其他人不同，张作霖接近于实现这个梦想，因为在称为军阀的那群怪人中，他或许是权力最大的一个。就这点而论，他深深地卷入了民国早期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同时，他的权势以中国辽阔的东北地区为基地。这个地区被相邻的日本和俄国称为“满洲”。于是，他又无法摆脱地陷入了中日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而在他死后十年，这个矛盾把两国，最后把整个亚洲拖入了战争。因此，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过去却几乎没有对他做过什么研究^[1]。因而本书在按照年代顺序构筑张作霖生平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在民国时期军阀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两个重要主题上了。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借此可能深化我们对当今中国工业化重要中心之一——东北早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理解。

问题无疑是错综复杂的，有关的学术文献又很缺乏，因此，有些论断

是尝试性的。我们希望，至少这将有助于对这些被忽视的重要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下面的引导性阐述意在确定背景和主角，并把注意力吸引到在考虑这些主要论题过程中所涉及的某些重大的历史争端上。

背景：是中国东北还是“满洲”？

山海关镇，位于北京东北大约二百五十英里的铁路旁边，在北部渤海的长城线上，是进入中国人通常称为东三省或简称东北的关隘。辽宁（旧称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面积合计略与法、德两国的面积相等。

在历史上，这个地区主要生活着三个种族文化群体，他们的历史大部分是由他们相互冲突的结果构成的。南部的辽河流域的农业平原，很早就居住着汉族人，他们从陆路经过山海关与华北其他地区 and 从海路越过渤海湾与山东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东部和东南部，是以渔猎为生的通古斯人，信奉萨满教，他们生活在森林中，鸭绿江、图们江和乌苏里江沿岸（这三江现在仍然划分着中国与朝鲜及俄罗斯的国际边界），西部和西北部的平原和草原是居无定所的游牧蒙古族人的家乡^[1]。

在这三个民族之间，在整个东北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当一个或另一个民族能够称霸的时候，就出现了持续不断的紧张不安和相互影响。因此，中国几个重要的王朝——辽、金、元，就像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一样，大致都是以这个地区为基地而崛起的。不过，与此同时，汉族文化的影响却持续不断地向北扩散，来自北方的征服种族自身都迟早会屈从于汉族文化的魅力。在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在现在辽宁、吉林两省东部地区的通古斯族，当时称作女真，从行政管理上分为三个部族，其中之一叫建州女真。这样的周期性历史模式重复着，渐渐地建州女真开始处于支

配地位^[3]。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女真部族统一了。一六一六年，他们的首领努尔哈赤称帝；一六二一年，攻占了明朝行政重镇沈阳和辽阳。努尔哈赤死后，其子阿巴海，一六四四年成功地把这个新的王朝（清）的首都迁到了北京，并统治了整个中国^[4]。

只是到了一六三五年，阿巴海才正式采用了“满洲”这个名字^[5]。它在藏语中的原意是“东方的光明”，最初是蒙古喇嘛对努尔哈赤的儿子们的一种尊称^[6]。按照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的说法，在阿巴海统治下，“满洲”一词渐渐作为一个群体名词用来称呼女真部族以及承认努尔哈赤领导地位的蒙古人和汉族居民。因此，它并没有明确表示任何一个同种同文化的民族或人种，况且，这是清朝快要占领北京时，才正式宣布使用的，那时，满族已经学到了“汉人关于统治、道德和教育的所有办法”^[7]。

阿巴海正式采用“满洲”这个词之后，“满族”这个词逐渐地被使用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用于乾隆皇帝钦定的一部十八世纪著作的标题——《满族源流考》，这部著作是以宣称其历史与文明可以与汉族相媲美的方式，来确立其非汉族统治王朝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尝试^[8]。满族延缓其被完全同化的一系列尝试，与其在中国确立其权势和特权的合法基础的用意，是众所周知的^[9]。而且，即使在创建清朝期间，在东北地区——他们的故乡，汉族人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努尔哈赤的部众，多至二比一^[10]。有一段时间，满族人鼓励汉族人移入东北。但在十八世纪初，作为同样是为了维持满族独占性统治的部分努力，他们转而下达了封禁令。但是，在十九世纪中期，最初是由于财政原因，他们再次开放大片土地，向汉人出售。法国旅行者古伯察于一八四四—一八四六年到该地区游访，他写道：“现在，你可以穿过满洲到达阿穆尔河^[11]，但根本不可能不认为你是正在中国的一个省里旅行。”^[12]后来，由于阿穆尔河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的割让，政府制定移民开发东北计划以免东北完全落入俄国之手的重要性加强了，于是，强

而有力的战略考虑也开始发挥作用了。对汉人移入的限制，渐渐地放弃了，到一九〇四年，最后一个地区解除了封禁^[13]。二十世纪初，当清朝快要结束之时，在大约一千四百万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汉族人^[14]。满族那时仍然是人数很少的民族。但是，由于他们形成了重要而易于辨认的群体，继续把他们称为满族是很恰当的。

然而，由于同化、通婚和汉化，满族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正在丧失其重要性，实际上，“满洲”这个词却开始变得重要了，由于与外国的单独联系增多，它成为十九世纪俄、日帝国主义实现其野心的一个方便的媒介。正如罗伯特·H·G·李在他的《清史中的满洲边疆》一书中所说的：“满洲这个词产生于近代，主要为西方人和日本人所使用。”^[15]

利用把东北叫作“满洲”这样一个显然无关宏旨的习惯，让“满洲”不是中国一部分的观念发展下去，是为了把“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最后，一九三二年，终于建立了日本的傀儡国“满洲国”。实际上，作为一个地理上或地缘政治上的术语，“满洲”这个词显然没有什么精确的含意，因为一直被称为东三省的“满洲”到一九三一年把热河包括在内了，扩大为四省，拼凑成了一个新的“国家”，这进一步说明了这个词的帝国主义政治的基本性质。通常，“满洲”这个词用于西方人的著作里。因此，它的帝国主义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学者依然说“中国和满洲”，正如说“中国和台湾”一样，把假定作为论据的这种狡辩，容易造成误解，因而是错误的。清除这个词与帝国主义的所有连带关系，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的。因此，本书采取了“整顿名称”的办法，只是在加上引号的情况下才使用“满洲”这个词，否则，就以简单而明确的术语“东三省”来代替，或者在不大重要的地方就用“东北”，后两个都是直接译自汉语的名词。

在某些情况下，二十世纪初期人们熟知的一些城镇，甚至省份的名称，后来改名了。因此，还存在其他专用名称的问题，由于本书所涉及的许

多官职和机构的名称，与当时的地名是一致的，作为一个一般原则，我们谈到地方时，就继续使用其旧称。例如，辽宁省与河北省，就用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年间普遍使用的名称——奉天和直隶。这条原则的唯一例外是奉天省的首府，曾被称为奉天、承德和沈阳（自一九二九年），城名不一。事实上，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九年期间，官方称为奉天市，或奉天城¹⁶⁶。因此，为了避免省名与城名相混淆，本书将后者称为穆克敦，这是“满族”的旧称，直到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西方也一直这样称呼¹⁷¹。

二十世纪初，东北的人口稀疏地分布在三省各地。农民居于江河流域及比较容易进出的地区，土匪、伐木者、淘金者、采参者以及鹿茸商和毛皮商则疏疏落落地散布于山区或荒凉的穷乡僻壤¹⁶⁸。这块边疆的发展的过程中，铁路之修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前喂猪的粮食可以运到市场，出口销售了。用于开发的技术、工人和资本迅即源源而来，主要来自俄国和日本，当然，也来源于中国自身。英国修建从北京到盛京¹⁶⁹的铁路，一九〇三年修到了新民屯。在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期间，筑路工程中断了。其后，一九〇七年，全线竣工了。俄国修筑的两千五百公里中东铁路，于一九〇三年竣工。它像个丁字形，横穿北部，并向南穿过了三省的心脏地区。竣工后不久，俄国的计划因在日俄战争中失败而不得不大加修改。在一九〇五年的《朴次茅斯条约》中，俄国租借地关东半岛和中东铁路长春以南线路的全部俄国权利，都转让给了日本。随后，在北京签订条约，中国政府正式同意了这种转让。

日本为了管理获得的这些权益，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新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这个南满铁路会社是个半官方的组织，一开始就有两亿日元的投资，是日本最大的公司，其日本名称常常简称为“满铁”。关东都督府，最初由一名都督管辖，负责租借地地区的行政，还掌管南满铁路线的警务。满铁远远不只是个铁路公司，实际上，它的第一任总裁后藤新